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一个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唐志军，王玉霞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0；东北财经大学富虹经济学院，山东大连，116023)

摘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解放思想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可以拓展理性的边界，使人的推断和预测更为准确；二是能简化决策过程、克服搭便车行为、增进合作和节省交易费用；三是能刺激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关键词：解放思想；理性；交易成本；创新

中图分类号：F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3-0392-07

对于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许多学者都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目前还比较缺乏。作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可能会以它特有的方法论、严密的逻辑性、恢宏的历史观、坚实的实证主义对此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并做出一些富有价值的新的论断。

一、从完全理性假定到有限理性假定的经济学

理性(rational)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经济学大厦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经济学家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1]。然而，经济学关于人的假设经历了一个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变。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即人是理性(经济人)的。亚当·斯密表述首先表述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13-15)] 亚当·斯密用“经济人”的思想，阐述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富裕”这个命题。他认为，在自由放任的社会里，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26-28)]。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完

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他们认为理性是价值最大化的代名词。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4]：①个体的行动决定(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合乎理性的；②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③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借助边际分析的数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构建了一个逻辑优美、结构严谨的经济大厦，全面论证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原理。

随着经济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不断地受到不同方面的批判与修正。现代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5]，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6]：①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②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人们所说的“经济人”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即它们具

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 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的特征, 以及他们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 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 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最高点的特征, 都是不现实的。因而西蒙主张人是有限理性的^[1](20-21)]。关于有限理性, 西蒙在他的《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中讲到, 根据米勒等人的发现, 短时记忆的容量只有 7+2 项(西蒙认为可能是 4 项); 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存入一项需要 5~10 秒钟(西蒙认为可能是 8 秒钟); 记忆的组织是一种表列等级结构(类似于电脑的记忆体有限, 从记忆体到外存的存取需要时间, 以及电脑的储存组织形式)。这些是大脑加工所有任务的基本生理约束。正是这种约束, 使思维过程表现为一种串行处理或搜索状态(同一时间内考虑的问题是有限的), 从而也限制了人们的注意广度(选择性注意)以及知识和信息获得的速度和存量。与此相适应, 注意广度和知识范围的限制又引起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类似于无知和某种目的意识所产生的宗教或信仰), 而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反过来又限制人们的注意广度和知识信息的获得(类似于宗教或信仰对科学和经验事实的抵制和排斥)。因此, 西蒙认为, 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 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 应当是过程合理性, 而不是本质合理性; 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 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决策者在决策之前没有全部备选方案和全部信息, 而必须进行方案搜索和信息收集; 决策者没有一个能度量的效用函数, 从而也不是对效用函数求极大化, 而只有一个可调节的欲望水平, 这个欲望水平受决策者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搜索方案的难易、决策者的个性特征(如固执性)等因素调节, 以此来决定方案的选定和搜索过程的结束, 从而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因此“管理人”之所以接受足够好的解, 并不是因为他宁劣勿优, 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根本不可能获得最优解。

二、从有限理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看解放思想的作用

(一) 解放思想能拓展人的理性边界, 提高人的推断和预测能力

我们可以说有限理性理论为解放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持。这是因为: ①思想的解放有助于突

破原有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和相互影响限制, 从而扩展理性的边界。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原有思想的束缚, 使其认知水平局限于某一层次和领域, 其行为动机局限于短期和局部利益而非长期和全局利益, 并使人们间的相互影响受“囚徒困境”的束缚而走向双输的死胡同。因而, 人们不能勇敢地去认识、面对和接受新鲜事物, 去尝试新的生活、生产和交易方式。而解放思想则则有助于突破原有认知、动机和相互影响的局限, 从而扩展理性的边界, 使人们能更好地把握局势、推断和预测未来, 增强变革和创新的勇气。②解放思想能增强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计算的能力。在旧有思想的束缚下: 一是, 人们无法认识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由于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 且成本是实实在在的、可能是要现期支付的; 盈利却是来自未来的现金流, 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样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幻觉, 使之忽视信息的价值和重要性, 认为不值得去为搜寻、获取和处理新的信息进行支付。对于计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思想的束缚会使人们忽视计算的重要性。二是, 即便人们认识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 也缺乏相应的能力或工具来处理和利用她们。解放思想则有助于解决信息和计算问题: 一是人们会认识到信息和计算的重要性, 并愿意为之进行支付; 二是, 会突破原有思维和方法的局限, 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和更精确地进行计算和规划, 从而缓解有限理性带来的问题。③解放思想能缓解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所引起的低效率、不公平问题。西蒙认为, 有限理性会导致价值偏见和目标认同问题, 进而会导致人们决策的低效率和不公平。解放思想则有助于缓解此问题。这是因为, 通过思想的解放, 人们能加深对于事物和世界的运行的认识, 了解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原因, 从而增进理解和宽容, 寻找到共同的利益交融点和价值支撑点, 并逐步形成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观和目标认同, 减少决策中的意见不一致以及摩擦和冲突, 提高决策效率, 并以一种慈爱的、宪政的眼光来看待弱者, 减少不公平问题。

(二) 解放思想能简化决策过程、克服搭便车行为、增进合作和节省交易费用

1. 解放思想能简化决策过程

人们在决策时总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导致决策过程旷日持久, 缺乏效率。这些因素包括包括: ①过程和结果不确定性。世界是个不确定的世界,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其结果也往往是不确定的, 人们无法完全预知。而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 如果人们总是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不突破思想的障碍, 可能导致在决策时犹豫不决、举

棋不定。②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的认知能力是受智力、信息和计算能力等因素制约的,其理性和认知水平是有限的,一个人无法全知全能,人作为一个整体也无法全知全能。因而,如果人们不敢突破旧有知识体系的束缚,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知识工具时,决策也可能变得困难而低效。解放思想则会让人们突破认知能力的约束,大胆地采用新的方法、工具、流程和制度,加快决策过程、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③决策过程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和利益追求,对于实现其最优利益的方法、过程的理解和诉求也不一样。因而他们都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决策施加影响和压力,多方向不断讨价还价。如果他们不能以一种共赢、共荣、共享的思维来博弈,那么就可能导致谈判费用很高、决策旷日持久,好的方案不能得到采纳,甚至导致冲突的加剧、社会的动荡。而如果博弈各方解放思想,突破那种狭隘的利益观和狭隘的利益追求,以一种宪政的、共荣共享共赢的思维来理解、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对受损的一方予以补偿,从而达成使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就可能加快决策进程,提高决策效率。④从制度合作效率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思想观念)作为世界观的价值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引导,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2. 解放思想能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

所谓“搭便车”是指,人们在狭隘的个人主义成本——收益原则的支配下,不付任何费用,从他人或其他团体那里获得好处^{7}。集体行动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搭便车”难题。“搭便车”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集团成员人数众多时,成员之间对违章者的监督费用以及处罚其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太高;二是缺乏对集体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激励机制;三是一个社会的产权制度供给不足。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时,理性的个体会选择搭便车,即希望由别人来提供公共品,自己免费享受公共品带来的好处。既然如此,那么集体行动会不会因为成员员的搭便车行为而走向无效甚至死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会采用多重制度来约束“搭便车”行为对集体行动所带来的伤害,这其中,解放思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从而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这是因为:①解放思想能减少集体行动中的监督费用和事后的执行费用。在成员相信集体行动中的有关制度、

行动程序是公平、公正的时候,他们对于集体行动的认同就会增强,从而会自觉地尊重有关行动规则,减少自身的“搭便车”行为^{[8](73-95)};而且,当多数人都认同集体行动规则时,那些“搭便车”者就会受到来自非“搭便车”者的谴责、鄙视甚至驱逐^{[9](90-114)}。而解放思想,一是可以提高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效率 and 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公正性,二是可以提高成员对集体行动规则的公平性、公正性的认同,减少其对于规则的敌视、反抗甚至是破坏行为,抑制其“搭便车”;甚至在“搭便车”者进行事后惩罚时,也会降低执行成本。这样,通过解放思想,就可以减少组织的监督费用以及事后对处罚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②解放思想能提供一种激励。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选择性激励是抑制“搭便车”行为的重要手段^{[9](95-114)}。费尔曼和甘姆森^{[10](8-44)}则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解放思想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成员对集体行动的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并使他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目标的价值,享受为实现社会目标做出贡献所带来的自豪和喜悦。③解放思想能增加产权制度的供给。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决定了一国的长期的经济绩效^{[11](18-28)}^{[12](1-20)}。然而,一方面,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品。产权制度的供给需要成本,而一旦供给出来,很多人却可以免费享用新的产权制度所带来的受益。因而,在产权制度的供给中,就会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必须要解放思想,使人认识到产权制度的变革能带来长期的利益增加;或使那些潜在的受益者认识到有必要对产权制度创新者提供补偿,而不是免费搭便车,从而使人们有激励承担提供新的产权制度的成本而去创新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在集体行动或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没有明晰的产权约束或由于许多权利束处于模糊地带,就为个人或团体钻“产权残缺”的空子,或化公为私、或化他人利益为个人利益提供了机会。而同时,监督、量度和事后惩罚的

成本却很高,进行产权变革的成本也常常高到无法承担,人们无力完全解决委托—代理中的机会主义问题。因而,在“产权残缺”的情况下,个人或团体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资本存量的多寡对约束个人或团体的“搭便车”行为或利己主义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任何成功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使一些团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简单地、享乐主义地和个人计算来行事。

3. 解放思想有助于增进合作,缓解“囚徒困境”问题

“囚徒困境”博弈是图克(Tucker)1950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博弈模型^[13]。人类经常面临“囚徒困境”的困扰,小到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大到国际契约和国际关系的处理(如:军备竞赛、污染排放、货币竞相贬值等),都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泥潭无以自拔。

“囚徒困境”表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为何会产生“囚徒困境”呢?解放思想有助于减轻“囚徒困境”难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①解放思想有助于增进博弈各方对合作的理解和对长期利益的珍视。“囚徒困境”产生的根源之一是博弈的各方在追求自己局部利益的同时忽视了他人的利益,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忽视了长期利益。如果博弈各方只重视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而忽视长期的、共赢的利益,那人类就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中,因为这时,选择合作一方将遭受损失,故博弈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必然是不合作,追求一种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解放思想能引导博弈各方突破原来的狭隘的利益观,认识到如果只追求一种狭隘的局部、短期利益,必将遭到博弈的另一方的制衡,自己短期利益的增加不能弥补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遭受的长期的损失,当前的非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会使自己的声誉、品牌、威信以及社会资本遭受极大的损伤,在长期中将得不偿失。而合作和共赢的利益观将会使博弈各方减少利益冲突,从短期和局部利益的诱惑下、从“囚徒困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追求一种基于合作的、双赢的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②解放思想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抑制“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时,博弈各方对于对手的策略、行为、价值取向和博弈结果都所知有限,故为增加自己的利益和讨价还价力量会采取许多防备、迷惑甚至是欺骗行动,而这些行动对于总的利益增加来说很多都是不必要的、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同时,信息不对称还使双方无法考虑合作时的总体利益的增加额以及对于双方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合意的利益分配。而解放思想将有助于双方价值取向和

利益的一致,并使双方认识到信息交流、交换和加强沟通、协商的重要性,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协商中采取既能增加共同利益又能协调利益分配的行动。③解放思想有助于降低对未来各方的贴现率,从而抑制“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博弈各方对未来利益采用一种较高的贴现率。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各方对当前利益的重视远远大于对未来利益的重视,他们只重眼前而不在乎未来怎样,他们只贪图眼前快乐而不顾未来死活,故在博弈中,他们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而非合作的行为,使博弈陷入“囚徒困境”。解放思想则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未来和现在同样重要,未来的享受需要抑制现在的消费,从而降低人们的贴现率,使他们更愿意合作和追求一生而非一时的快乐。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将可以决策过程的简化、搭便车行为的抑制、“囚徒困境”的缓解,而这将会大大地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增进人们间的合作,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 解放思想能刺激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创新和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主要决定力量。索洛^[14, 15]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0%。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乔根森和伊普^[16]对多国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接近50%的日本产出增长以及超过40%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TFP增长。而罗默^[17]、卢卡斯^[18, 19]认为只要创新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赫普曼^[20]则强调,创新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毁灭”过程,而经济增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的。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研究都表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

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亚当斯密^[21]很久前就指出产权保护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诺思分析了整个历史过程中制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他看来,国家和个人财产权的划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组织(制度)成功或失败直接导致了社会进步或倒退,技术知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22](59)]。诺思同样把工业革命视为重要的制度和组织变革^[22](159-160)]。此外,巴泽尔^[23]、格雷夫^[24]、詹科夫和拉·波塔^[25]、巴罗^[26]、Patrik Gustavsson & Joakim Persson^[27]、威廉·伯恩斯坦^[28]、张五常^[29, 30]、张维迎^[31, 32]、林毅

夫^[33]等学者都认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解放思想能促进技术和制度创新,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因为:

1. 解放思想有助于有效发现和识别潜在机会,从而促进创新

熊彼特^[34]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笔者认为,所有的创新,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潜在利润的认识(当然,这里的创新主要指来自企业的创新,而在当代社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将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体)。创新是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极高的过程,如果企业不能有效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不能比较可能支付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期望利润,企业是不敢贸然进行投资于创新的。而有效发现和识别利润的过程是一个受思想观念和信息知识制约的过程。思想观念的束缚将:

①导致人们盲从于旧有的权威,不敢突破其知识体系的束缚,进行大胆的创新。这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

②限于旧有思维,不能发现创新的可能突破口;也不能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和可能的利润增长点,也不敢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在旧的思维和观念下,人们只会更多地原有的市场里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采用的都是通行的“红海”战略,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而不是大胆地进行创新和突围,发现“蓝海”并实行“蓝海”战略。

③导致人们害怕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不是寻找不确定性下的利润来源。旧有思想会使人变得迷信、短视和怯弱,在投资于创新时,更多地考虑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犹豫不决,而不是审视不确定性和风险背后可能隐藏的巨大的利润来源和利润空间。他们不能认识到,利润恰恰来自于不确定性。西谚说“利润是风落之物”,也即不确定性是利润的来源,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是没有利润的。

④不进行思想解放的话,人们就很容易躺在过去成功的温床里不思进取、缺乏忧患意识,这样也会导致人们没有激励去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而解放思想则有助于解决上述的四个束缚,引导人们有效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从而大胆地进行创新。

2. 解放思想能强化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变革创新模式、加强创新投入

一般来说,模仿比创新相对容易,而且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相对较小,故很多个体、企业甚至是政府都愿意模仿或者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一下改

进,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进行原创性的创新,才能真正提高一个企业或一国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受制于对手的专利技术或高技术所带来的高效率的威胁,才能在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占据较有利的位置。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然而,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企业和政府都能解放思想,真正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使创新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把创新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变革创新模式、改革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加强创新投入时,创新才能真正得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

①解放思想能促进创新模式的变革。创新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好的有效率的创新模式是基于各创新主体的比较优势和既有的知识筹备和人才储备上的,而且,创新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必须与各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相适应,否则,在创新上的高投入并不能带来高产出。这就需要各创新主体解放思想,寻找真正适合于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知识储备等的创新模式。

②解放思想能拓宽创新主体的视野,使其寻找有效的外部资源。就我国的许多企业和地方来说,自身所拥有的人才和知识资源都比较贫乏,经济发展缺乏项目源、技术源、人才源的支撑,这就要求他们解放思想,寻找有效的外部力量,如强化产学研合作和对外科技合作,通过同各大学和科研院所进行合作来获取创新成果。

③解放思想有助于解决创新中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创新是一种不同于生产的活动,其所要求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要求更自由的、更扁平化的管理机制和更人性化、更分权化、更具挑战性和更着重技术入股的股权激励机制。而这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唯有解放思想,才敢采用能促进创新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

④解放思想能促使创新主体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设计出较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基础,没有完善、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国的创新是不持久的。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设计是一个两难问题,对创新保护得过于严格,则会妨碍技术外溢;而对创新保护不力,则会抑制创新。这就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寻找一种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⑤解放思想能推进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创新需要很大投入,而且面临很高的风险。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引进风险投资资金,建立一种适合知识创新的投融资体系。

3. 解放思想能使人深入比较不同制度运行的成本和不同制度安排的运行细节和相互关系,减少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对于制度认识的僵化

在经历过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和长达 10 年的社会动荡后, 改变旧有的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政治体制, 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在转轨时期必须面临的任务, 就这一点来说容易取得共识。因而, 在改革的初期, 全社会都认为必须要进行变革了, 再不变革, 整个国家就有陷入崩溃的可能。然而, 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改革, 何处是改革的方向? 在改革初期,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如何进行改革、改革的最优模式和路径是什么, 因而, 邓小平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高成本的“过河”方式, 如果我们能更深刻、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方向, 具备更好的有关“过河”的技术的话, 其成本可能会大大降低。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具备较完备的关于不同制度运行的知识的话, 我们的转轨过程可能会加快、转轨成本会更低、取得的成效会更大。然而, 我们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或者我们大体上知道某种制度安排的绩效如何, 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制度安排运行背后的原因, 不清楚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组织、如何协调的, 也缺乏这种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知识, 更缺少这种制度安排与其他的制度安排之间如何协同的相关知识。然而, 一种制度安排要起作用, 我们必须要知道其运行背后的原理、其运作的细节以及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如果信息不完全, 对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 必然产生一些混乱, 导致改革进程的高成本甚至是停滞不前。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过去我们对于不同制度只是泛泛地进行一些大而空的所谓的批判, 缺乏深入地研究, 缺乏不同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其运作的细节、不同制度安排是如何协调的等知识, 对导致一国长期经济绩效好坏背后的制度安排等细节知识更是知之寥寥, 正因为此, 导致我们建国后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运行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而解放思想, 能促使我们以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上存在的多种制度及不同体制, 促使我们加快学习不同的有关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的知识, 深入理解不同制度和体制的利弊、短长、其所能和所不能以及不同制度安排为何导致不同经济绩效的原因等; 也能使我们克服意识形态的桎梏、摆脱旧有的僵化认识, 以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评价并大胆地吸收和采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为优秀的各种制度安排, 从而减少制度建设和变迁的成本。

4. 解放思想能增加对新制度的认同从而降低其运行成本

在重建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过程中, 一方面

我们要解放思想, 大胆吸收目前他国已有的被实践证明为优秀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就是突破旧有思想的约束, 大胆地进行创新, 寻找与我国现实紧密结合并能更好地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和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和的制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有独特复杂性的大国, 这主要体现在起点低、资源禀赋稀缺、发展(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等方面)不平衡、知识储备少、受旧有意识形态束缚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格局复杂等方面。这就限制了我国和我国的不同地区照搬照抄国外已有的成熟的制度安排, 也限制了我国各地区采取统一的制度安排。因而, 我们必须一方面因地制宜, 大胆地进行创新, 寻找与本地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搞太多的地区主义、搞地区分割从而使得地区与地区间的协调和交易成本太高。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 一方面对各地地区的制度创新要多包容、多鼓励, 增强对新制度的了解, 如果新制度能以更低的成本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那我们就大胆地认同它, 并在适当时机推广; 对于那些失败的制度创新也要包容, 因为制度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创新, 失败不可避免, 关键是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寻找到更好的创新点。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引导各地区在追求地区利益的同时, 着眼于全局; 追求短期发展的同时, 更多地考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要使地区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耦合于全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 减少不同区域间的制度协调成本和制度运作成本。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企业、一个人要想取得不断的进步, 必须要解放思想, 用解放思想来突破有限理性的束缚、来促进合作和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来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赫伯特·西蒙.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2]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 [4] 丘海雄, 张应祥.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J].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8, (1): 117-123.
- [5]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 [6] 赵子红, 杜育宏. 西蒙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探微[J]. 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2): 17-21.

- [7] 杨俊一.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视角[J]. 哲学动态, 2001, (4): 2-6.
- [8] 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9]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FIREMAN AND GAMSO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M]. Winthrop Cambridge, MA: Little Brown & Co, 1979.
- [11] 张五常. 卖桔者言[M]. 香港: 花千树出版社, 1984.
- [12] 诺思.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3] 谢识予. 经济博弈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SOLOW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65-94.
- [15] RM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Vol. 39, No. 3: 312-320.
- [16] JORGENSEN, D.W. & ERIC YIP. Whatever happened to productivity growth?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R]. Chicago, Uni. Of Chicago press, 2000: 509-540.
- [17] ROMER,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5): 1002-1037.
- [18] LUCAS, ROBERT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1): 3-42.
- [19] RE LUCAS.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0] HELPMA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 [2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2]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23]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4] 格雷夫. 后中世纪热那亚自我强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1, (2): 1-18.
- [25] 詹科夫·西蒙, 格莱泽·波塔. 新比较经济学[J]. 比较, 2004, 10: 9-37.
- [26] 巴罗. 现代经济周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7] PATRIK GUSTAVSSON, JOAKIM PERSSON. Geography, cost-of-living, and determinants to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the Swedish regions[R]. Working Paper No 186, December, 2003: 1911-1993.
- [28] 威廉·伯恩斯坦. 财富的诞生[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 [29] 张五常. 二十一世纪看中国的经济革命[M]. 香港: 花千树出版社, 2002.
- [30]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M]. 香港: 花千树出版社, 2008.
- [31] 张维迎.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 and 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 经济研究, 1996, (9): 1-12.
- [32] 张维迎. 中国改革 30 年--10 位经济学家的思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3]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1.
- [34]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Why should we emancipate the mind—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TANG Zhijun, WANG Yuxia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0, China;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we conclude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First, it can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rationality of mankind, making mankind to hav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inference; Second, it can simplif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vercome free-riding behavior,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save transaction costs. Third, it can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ystem and promot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we must continu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so as to promote and deepen China's refor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 thoughts liberation; rationality; transaction costs; innovation

[编辑: 颜关明]